

儿女情多 风云气少

——《花间集》内容新评

沈祥源

傅生文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后蜀赵崇祚编，共十卷，录词五百首。花间派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人的代表作，大多赖以保存下来。它是研究我国词学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文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一)

《花间集》中的词，多数是写男女艳情、悲欢离合、旅愁闺怨、伤春惜时的，直接反映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题材极少。陆游在《花间集跋》(之一)中批评道：“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花间词，相反给了它较高的历史评价。在《花间集跋》(之二)中，他说：“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

从前人对花间词的评价来看，各有所执，毁誉并存，但总的倾向还是称赞多于谴责，“功大于过”这一习惯性评语施诸“花间”，也还合适。孰料近几十年，花间词逐渐被否定了，它成了词的发展史上的“一股浊流”，戴上了一顶“反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帽子^①，中国文学史上已没有它的地位了，这是不公平的。对《花间集》这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遗产，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只能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其内容形成的社会根源，发掘这些作品本身的实际意义和美学价值。

花间词产生的背景是唐帝国从衰弱走向灭亡和五代十国分裂混乱的年代。唐自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一统的大唐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花间词人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就是生活在这干戈骚屑之世。到了五代时，中原依旧云扰，社会衰微，前蜀和后蜀的词人薛昭蕴、魏承班、欧阳炯、顾夔等，虽处在“西南天府”，但也只是相对的安定些罢了。中原混乱的景象，必然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着他们。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既可以产生一些反映这个时代本质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可以产生一些逃避斗争、追求安乐的个人抒情作品。花间词多属后者，它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词人生在极乱时代，无力拯救世态，挽回局势，又不能洁身而退，于是“以醇酒妇人陶醉自己”^②，所以他们的感情多趋于幽愤、沉静、颓丧，他们的词也就自然地注重于个人生活情趣的表现了。

当时某些社会风气和词体本身的特点，也是与花间词的内容形成紧密相关的。

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唐代，文人们的生活情趣大都不很严肃，放荡而不守礼法，以狎游畅饮为乐事，他们与歌妓、舞妓一类的女性关系密切。清人王文诰所辑的《唐代丛书》中，就记载了许多文人赋诗赠妓的佳话。到了中晚唐，此风更盛，“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③，“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④。文人们的这种风气，是必然会在他们笔下表露出来的；而表露风流艳事和抒发缠绵情怀的形式，莫过于在樽前月下浅唱低吟的词了。

词这种新兴的文艺形式，为适应唐代都市生活和商业的蓬勃发展，首先在民间产生了。那时流行的曲子词，一般都能反映现实生活，其内容比文人词丰富，题材也要广泛一些，但还是以爱情，相思之类为主，在一百六十多首敦煌曲子词中，这类题材约占一半，这是我国民间情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文人词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唐时期，刘禹锡、白居易等，受到民间词的启示，偶尔兴到，染指尝试，题材亦多此类。到了晚唐，作者渐多，词也慢慢地成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在秦楼楚馆、歌台舞榭中纵情享乐的专利品了。作为花间派鼻祖的温庭筠，就是适应这种社会的需要而“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这样的词，多是给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去歌唱的，故其内容自然而然地偏向于温香软玉的一面，使民间词中男女相思的内容更扩大了，更深化了，更细腻了。欧阳炯的《花间集·叙》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花间词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学氛围里，他们是很难摆脱“绸缪婉转之度”，而又“一洗罗绮香泽之态”的，当然更谈不上去抵制这种香风艳雨的浸蚀了。这样一来，词便以描摹风流韵事为主要职能了。诗，当然也可以用来表现男女之情，但它毕竟是历史悠久的“旧家世阀”，六艺之首，为我国正统的文学形式，道貌岸然，轻浮不得。而词兴起不久，“初生牛犊”不必如诗那样讲究身份，许多在诗里难以出口、有失尊严的事不妨在词里描述。只要把爱情诗与爱情词比较一下，前者大都含蓄庄重，后者却那样恣放柔媚。我们读读温庭筠、韦庄和宋初文人的诗和词，就不难发现爱情这一题材从古体诗转移到近体诗，又从近体诗乔迁到词里的足迹。词的本身句式灵活多变，语调抑扬有致，韵位疏密相间，特别适宜于表达婉转柔约、细腻排侧的感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一语道破了词的本色。

(二)

文学作品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生活决不是一个模式，而是异常丰富多采的。李泽厚同志曾说：“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境界，有各种各样情感思想的境界，于是才能有各种各样的艺术中的境界。……而不论哪种境界，只要善于选择、集中和提炼，使之能深入地展示出某方面的生活真实，就能给人以美感享受。”^⑤因此，在评价古代文学作品时，仅用人民性、反映阶级斗争等之类的政治标尺去衡量，显然是不够的。在人类文学史的长河里，大量是描写男女之恋，亲人之爱，朋友之情，山川之美的作品，这些作品同样可以美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这些作品千百年来一直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甚至不同民族的人们所传诵不衰，足见其具有何等感人的艺术魅力，对此，前人也有了足够的认识。南宋的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话对花间词也是适合的。花间词多数是写对所爱之人的怀念，男女的青春热情和离别的愁思，这类词，无论是词人的主观感受，还是客观描写，都是具体的，合情合理的。词人没有歪曲生活、粉饰生活，更不是宣泄邪恶，

海淫海盗，所以，它能使人意味到在这样的情景下，这样的思想感情是真实的、善良的、美好的。这类词也艺术地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某种社会生活，并非毫无认识作用。词人们生活在那个“不如意事常八九”的动乱岁月，盼“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是那时许多人的共同愿望。词人们从相思和爱情的角度，表达了对春天、对人生、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即使是有些低沉、感伤，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醉生梦死、流连光景之作。如韦庄的《菩萨蛮》其四，

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
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在旷达字句的背面，深含着悲愤和愤恨。作者面对战乱世道，身避异乡，国恨家愁，涌上心头，但又无可奈何，只有以酒消愁了。从他醉意朦胧的呵呵声中，我们难道听不见他心灵深处的哭泣声吗！《花间集》里，象这类作品并不罕见，就从这些“半为枕前人，半为花间酒”的描写中，我们体察出了那个时代的阴影。

花间词里，还有另外一些内容，如边塞风光、纪俗描景、宫怨怀古之类，为数虽少，但意义深远，对后来词境的扩大，题材的开拓，颇有启迪。如毛文锡的《甘州遍》其二：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

沙飞兼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番奚。凤凰诏下，步步蹶丹梯。

这首词生动地描绘了边塞荒寒肃杀的景象，也表现了戍边将士为国立功的辛劳。在唐代边塞诗和宋代边塞词之间，有了“花间”中的这类词作，其发展脉络就很清楚了。

再看薛昭蕴的《浣溪沙》其七：

倾国倾城恨有余，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 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

这是一首凭吊古迹之词。上片写昔日的繁华风情，下片写眼前的冷落衰败，在今昔对照中，霸王雄图，美姬韵事，俱化烟云，无限苍凉的感喟，委婉透出，是何等深沉之笔，比之唐人怀古之诗，亦不逊色。还有毛熙震的《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鹿虔扈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等，都属言简意深的怀古词。

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可作“花间”写景纪俗词的代表，现举“其四”为例：

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倚春风相对语。

这简直是活动着的电影镜头，不只是一幅画。词人信笔写来，不着雕饰，而南国风情，痴儿憨女，跃然纸上。李珣的十首《南乡子》也是描摹南国风物的，笔触别致，朴而不俚，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此外，还有写处士心怀，深藏着身世之叹的词，如李珣的四首《渔歌子》，呼出了“不见人间荣辱”、“名利不将心挂”、“不问人间醒醉”等语，难道作者真如此旷达而与世无争吗？据《茅亭客话》记载：“珣有诗名，以秀才豫宾贡，事蜀主衍。国亡不仕，有《琼瑶集》，多感慨之音。”⑥可见李珣有些词虽寄情于山水酒渔，意则在不满现实，其人品在花间词人中属高风亮节之佼佼者。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说：“花间词人能如李氏多面抒写者，甚鲜。故余谓德润词在花间可成一派而可介立温韦之间也。”⑦此言李珣词内容是多方面的，决非只有绮罗香泽。

花间词写女性，多为赞美和同情之意，少有玩弄和玷辱之心。如牛峤的《西溪子》：

捍拨双盘金凤，蝉鬓玉钗摇动。画堂前，人不语。弹到昭君怨处，翠娥愁，不抬头。

这首小词选截了琵琶女弹奏乐曲的一瞬，揭示了她内心深藏的无限幽怨，把难以言状的情绪

通过“不语”、“不抬头”的形态表现出来。有了作者对琵琶女的同情，才有这样入微的体验。

再如韦庄的《浣溪沙》其三：

惆怅梦余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窗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

满身香雾簇朝霞。

春雪冻梅，香雾簇霞，烘托出一个绝艳的形象，这不仅赞美了意中人的外貌，更爱慕她清丽的标格，令人为之倾倒。

《花间集》还有一个比较新鲜的题材就是描写科场及第、金榜题名之乐，如韦庄的《喜迁莺》其一：

人骖鹤，鼓咚咚，襟袖五更风。大罗天上月朦胧，骑马上虚空。 香满衣，云满路，鸾凤绕身飞舞。霓旌绛节一群群，引见玉华君。

这首词用登仙境的快乐，表示登科之乐。先写庆贺及第的欢腾场面，次写登科者的得意神情。《喜迁莺》词牌是取《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意，喻由困而亨，由卑至高。在封建社会，读书人把金榜题名当作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途径，一旦实现，其愉悦之态，是可以想见的。薛昭蕴的三首《喜迁莺》，和凝的《小重山》其二，也写出了中举时的欢快乐情。这类词并不庸俗卑下，追求功名在当时也有某些积极意义。

从以上所举数端可见，在五彩斑斓的花间锦绣丛中，有这样一些感慨淋漓、格调清新、别开生面、情真意切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花间词的内容决非单一的模式。

(三)

这里还有必要谈谈《花间集》中关于男女幽会、狎昵之类艳事的描写问题。有的评论者说：“在一本《花间集》里，全被这些色情的气味涂满了。结果流于淫靡荡俗，词格非常卑弱”。^⑧还有的说：“淫巧侈丽之词，真是触目皆是。”^⑨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吓人。我们对五百首花间词的内容大略统计了一下，描写边塞风物、乡土人情、升平景象、怀古伤今、旅思咏物的约六十多首；抒写离情别绪、闺怨春思的约四百一十多首，以上作品并未发现有什么“淫荡”之处。还有二十多首词，确实写了男女的幽会和亲昵，然而多数却是真挚的、具体的男女互爱。如韦庄的《女冠子》“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牛峤的《菩萨蛮》“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牛希济的《生查子》“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和凝的《山花子》“佯弄红丝绳拂子，打檀郎”；孙光宪的《菩萨蛮》“握手送人归，半拖金缕衣。”诸如此类，写得率露朴质，形象逼真，充满了儿女间正常的生活情味，似乎也无“淫荡”可言。剩下极少数几首，隐约地写了云雨之情。然而，即使是在旧时代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中，往往也夹杂着一些自然主义的败笔，这并不足怪。《花间集》中有一些，应予批评，但大可不必用“涂满色情”之类的不实之辞来给以全盘否定。此外，《花间集》里也确实还有一些庸俗的、消极的和并无真情实感的无聊之作。如有些作者的《女冠子》，拼凑词句，用以描摹女道士的外貌衣着，从思想到艺术，都无可取之处。如薛昭蕴的《女冠子》其二：

云罗雾縠，新授明威法箓，降真函，髻绾青丝发，冠抽碧玉簪。 往来云过五，去住岛经三。正遇刘郎使，启瑶缄。

意境平庸，语句生硬，读之味同嚼蜡，实为“花间”下品。

由于长期封建道统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写男女之情、闺帷之意的作品视为“郑卫之音”，有伤大雅。但是，异性的相亲相爱毕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无论圣贤君子们怎样掩示和

轻蔑，忠于生活的作者们总还是要千方百计地抒发这种情感的。人们的爱虽有多种多样，但最深挚、最具体、最易受感动的莫过于男女之间的爱情了。叶嘉莹教授认为，许多写爱情的作品，“纵然在外貌上所写的只是一些并不合于伦理价值的情诗艳词，可是就其本质所能带给读者的影响而言，有时却竟能唤起读者心灵中某种崇高美好之意念，而引起一种正面的伦理的感发”^⑩。《花间集》中多“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帷之内”的作品，正是它独具异色、一反儒道的可贵之处，这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和民歌中的情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专收写情爱和写妇女的作品的集子并不多。六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是第一部，而《花间集》则为第二部了。吴世昌先生曾把前者称为“唐以前的《花间集》”，一语道出了它们之间的起承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花间集》冲破了正统的封建文艺观的禁锢，保存了一批具有感发生命之花的词作，这些“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的艳词，在我国万紫千红的古代诗坛上，也算是一枝奇葩。

对花间艳词的评价，历来就有分歧。常州派词人张惠言等，为了抬高这类词的地位，采用了经学家惯用的手法，硬说美人香草有所寄托，牵强于君臣朝野，附会于风雅楚骚，似乎只有这样才属不朽之作。这种看法，已遭到王国维、李冰若等人的驳斥。此后，一些评论者又以这类词属“齐梁宫体”、“格调卑下”，“思想和艺术都无可取，消极影响很大”，加以排斥。以上一褒一贬，态度迥别，但究其因，却同出一源。在古人那里，强调“文以载道”，如不将艳词附会于“道”，则艳词就成了纯粹的淫词，还有什么“深美宏约”可言；而在某些今人这里，信奉“题材唯一”，如不反映阶级矛盾和重大的社会斗争，还有什么精华可吸收！在这种狭隘的批评观盛行之日，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就只有那么几位作家可赞，那么几部作品可读了，其余则无足道哉。花间艳词自然更属等而下之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批评有了新的进展。文学史家们按照文艺科学本身的规律和标准，去研究古代作品。不同题材、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⑪。那么，究竟怎样对待花间艳情词呢？不妨先看几首作品：

晓彩霜华夜不分，天外鸿声枕上闻。绣衾香冷懒重熏。 人寂寂，叶纷纷。才睡依前梦见君。
韦庄的这首《天仙子》，写出了闺妇怀人的深情。她独守空房，夜阑不眠，窗前月华，天外鸿声，更引起她对情人的思念；然而，现实却得不到感情的满足，她内心苦楚，精神倦怠，刚一合眼，就仿佛见到情人的身影。这类闺怨缠绵的词作，抒发了旧时代妇女的共同情思。正因为离别苦，相见自然是欢了，一旦有了良辰好景，谁不纵情：

相见休言有泪珠，酒阑重得叙欢娱。凤屏鸳枕宿金铺。 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

欧阳炯的这首《浣溪沙》，是“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⑫。一些评论者也将它作为花间词淫荡的铁证，其实这首词在《花间集》中，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如此，但因它情真意切，笔触秀丽，读来还并不令人作呕。李冰若先生曾评此词：“叙事层次井然，叙情淋漓尽致，而着语尚有分寸，以视柳七黄九之粗俗不堪，自有上下床之别”^⑬。情与淫之分，读此自明。此外，韦庄的《江城子·恩重娇多情易伤》、顾夔的《荷叶杯·记得那时相见》、和凝的《临江仙·披袍窄地红宫锦》等，也写了绣屏鸳鸯之类，但比起欧阳炯的这首则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因而就更非淫靡之作。

“相见时难别亦难”，欢会之后，又是依依难舍的告别，请看牛希济的《生查子》：

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写得何等真切！意境深沉秀美：残月映脸，别泪晶莹，语多情难尽，欲去又依依。如痴如醉的嘱咐：见到了芳草之绿，联想到罗裙之绿，怜爱罗裙，情及芳草。一洗浅薄庸辞，读之百遍不厌。

在那个时代，青年人大胆地追求爱情自由，这是他们心灵深处的火花，客观上是对虚伪的封建意识的反抗。韦庄的《思帝乡》就是代表：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对所爱之人一往深情，愿将一切交给他，纵然遭遗弃，也在所不辞。语辞痛快，非坚贞何敢出此言！常道“多情女子薄情郎”，妇女要“从一而终”，而男人便可寻花问柳，这给女子带来了无穷的精神痛苦，她们无可奈何，在词中常常透露抱怨之情。牛峤的《梦江南》，通过咏鸳鸯交颈而怨郎薄情：

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

花间词里的女子，也并不都是柔弱之辈，总是“恨郎何处纵疏狂？长使含啼眉不展”。有时她们也撒娇，捉弄情人，如“佯弄红丝蝇拂子，打檀郎”；“上马出门时，金鞭莫与伊”；“佯不觑人空婉约，笑和娇语太猖狂”等，都是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特别是张泌的《浣溪沙》，活活地画出了一幅“男追女，女逗男”的风情画：

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漫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

这样大胆调情的意境和轻松活泼的文笔，汉魏乐府中亦不多见。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轹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①。我们并不同意他把《古诗十九首》中的这些诗称为淫词鄙词，但他“以真为美”的批评观，对我们评《花间集》中的艳词，还是有所启示的。这里并不是提倡人们去读写艳词，而是说这些东西已经出现在文学史上而又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作为文学研究者，就不能简单地否定，而要审慎对待，通过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也许还能发掘出一些美的因素。

总之，《花间集》内容的倾向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清人郭麟说：“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②花间词也就象我们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学画廊中的一幅美人图，它不如英雄画那样豪壮，也不如圣贤像那样高洁，但它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注释：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②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3页。

③ 李肇：《国史补》。

④ 杜牧：《感怀》。

⑤ 李泽厚：《美学论集·意境杂谈(续)》。

⑥ 《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三。

⑦⑬ 李冰若：《栩庄漫记》，转引自《花间集评注》。

⑧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第178页。

⑨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532页。

⑩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8页、第365页。

⑪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⑫ 况周颐：《蕙风词话》。

⑬ 《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⑭ 《词话丛编·灵芬馆词话》。

(上接第106页)

员即达1000人，以后又发展到5000人，出版自己的杂志及各种著作。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他们象其他领域的新左派史家那样，强调“从下往上”的研究原则，即把着重点从统治阶级、英雄人物身上转移到广大人民群众方面来。如华盛顿大学青年女教授裴宜理(Perry, Elizabeth)1980年出版了《从造反到革命：1850—1949年间的淮北地区》，研究探讨了该地区捻军、红枪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周锡瑞(Esherick, Joseph)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把着眼点移到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方面，不局限于几个英雄人物。当然，他们的指导思想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各种激进思想的杂烩，其政治态度往往偏激，而且目前这一派还未产生有份量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他们的研究也有简单化的毛病。这一派的出现是美国官方史学危机的结果，而它的出现又加深了官方史学的危机。许多官方史学家在新形势面前也放弃或修正了以前那种露骨的观点。

进入80年代后，由于中美建交，美国的中国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搜集资料、研究问题，同时邀请中国学者赴美讲学、交流。这必然促进了它的发展。美国研究中国的历史、现状比过去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其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的提高。尤其值得提出的，它也正在追随“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的榜样，打破传统的“单科独进”的研究方法，实行多学科互相交错、互相渗透的跨学科方法(interdisciplinary)，从历史、文学、哲学、经济、政治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总体研究。目前，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大学公开提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主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动向。

注释：

①③ 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载《美国历史评论》1969年第3期。

②⑦⑨ 《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68、209、91页。

④⑥ N.R.凯迪：《穆斯林中东史》，载M.坎曼：《往昔》(1980)，第131、114页。

⑤ 王家骅：《美国研究日本史概况》，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9期，第16页。

⑦⑩ 菲利普·D·柯廷：《非洲史》，载坎曼：《往昔》第114页。

⑧⑨ 林德贝克：《了解中国》(1971)，转引自《外国研究中国》第4集第133、132页。

⑩ 巴尼特：《美国同中国之关系》，载《七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译文集，第18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文版)，第352、272、273、272注解、115、121、355、353、353、274、5、3、2页。

⑰ 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载香港、《抖擞》1980年11月号，第11页。

⑱ 郝克敏：《中国历史参考文献评论》(1958)，译文载《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381页。

⑲ 刘广京：《三十年代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06页。

⑳㉑㉒ 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1960—1971》，载北京大学学报编辑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与资料》(1973年)。

㉑ J.W.霍尔：《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载前引坎曼编《往昔》第162页。

㉒ 该刊为英刊物，但编辑及撰稿者主要是美国人。